

喜相與藝香炎：搯土額上迎君入
 兮君使人盡土若此君果賢已乾隆
 丁亥十二月君召父息太官安兮土人
 留君在官終喪格兮飭不果行於
 安兮土人火從君哭已走若喪其父越
 君竟死矣悲夫君諱興讓字禮
 先世自陝西渭南徙山面兮遙土
 府兮遙縣人曾祖諱紹儀祖諱
 諱大璣縣學億行生例贈文林郎
 生也君家累世同居冑堂先生與

朱筠、毕沅、阮元 三家幕府与乾嘉碑学

张俊岭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公祖于到局日衆紳士呈單不妨以風聞
 和除一兩人庶實心辦事之人方可以不辭
 勞苦此實為公事起見并望
 公祖密之若一宣泄不止邵氏為怨所累
 恐亦于公事無濟也 名另東請具

朱筠、毕沅、阮元
三家幕府与乾嘉碑学

张俊岭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与乾嘉碑学 / 张俊岭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308-13404-0

I. ①朱… II. ①张… III. ①幕府—影响—碑刻—书
法史—中国—清代 IV. ①J292-09②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8294 号

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与乾嘉碑学

张俊岭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hlpp_lp@163.com)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405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404-0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一

清代明确的碑学理论,为阮芸台肇其端,包慎伯扬其波,康南海集其成。然这三家碑学理论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肥沃的历史土壤和厚实的既成基础,也就是说,有同时代和稍前时代一大批学者和书家的碑书实践与碑学观点作为根基。《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阮芸台)、《艺舟双楫》(包慎伯)、《广艺舟双楫》(康南海)的著述是水到渠成、孕足而娩的时代使然,其坚实基础是清代乾嘉时期无数搜碑者、学碑者、研碑者、崇碑者在实践和探究中所立下的种种功劳。张俊岭副教授撰写的《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与乾嘉碑学》一书比较清楚地梳理出了清代乾嘉时期许多学者和书家的这种种功劳以及所取得的种种成果,并揭示出了幕府对于碑学的意义。

书中第五章写到一位对贵州学风影响较大的学者,他叫莫与俦(晚清篆书家兼学者莫友芝之父),其晚年所作诗中有这四句诗:“老来不记旧卿相,犹记先辈之高风。乾嘉之际盛人杰,翘者未易遽数终。”诗的前两句颇为契合我作序时的思想,后两句很恰当地概括了乾嘉时期人才层涌、群星璀璨的壮观局面。如果说莫前辈用精练的诗笔概括出这种壮观局面的话,那么本书则是用丰富的史料、有力的引证、辐辏式的笔法、以点带面和以面托点的结构,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种壮观局面。书中,作者围绕着朱筠幕府、毕沅幕府、阮元幕府三条主脉展开搜索、挖掘和梳理,将幕主、幕宾及幕外师友的碑学研究、书法实践、学术探讨、文化活动、教学践行以及人际交往作一一揭示,为我们展现出了乾嘉碑学中群峰迭起的历史人物群像。书中的朱筠、毕沅、阮元、纪昀、戴震、王昶、钱大昕、翁方纲、王念孙、邵晋涵、程晋芳、章学诚、段玉裁、姚鼐、桂馥、黄易、钱坫、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汪中、伊秉绶、钱泳、张惠言、邓石如、陈鸿寿、何绍基……这些著名学者和书家便是书中所展现的人物群像中的佼佼者,其中有的是学界山斗,有的是碑书大师,有的是幕府主帅,有的是馆阁臣公。这许多学者和书家及其名著名作,平时在我们头脑中是散乱的、无序的,当读完此书之后,头脑中散乱无序的人物及其著作也都变得历历有序、脉络清晰了。

此著价值还不仅仅在于此。书中还直接或间接地向读者呈现出三个引人思考的问题:

一、《说文解字》很重要。读古籍或写篆书必须先识篆，只有掌握了篆字才不至于搞错文义、写错文字。要识篆，首先要掌握《说文解字》。作者借书中幕主的主张和行为——对《说文解字》的尊崇、校订、印行，表达了自己同样的观点。而当今某些写篆书、作篆刻的人写了错别字还全然不知，反而炫耀自己的“高深”，这是多么令人可笑。

二、有位才有为。乾嘉时期的诸位幕主凭着自己的地位、财力和手下人才，高扬学术与文化的旗帜，开展搜碑、研究、编纂、教育、创作、交流等实践活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可谓大有作为。而这大有作为首先取决于幕主的“有位”。如果是一位无位的寒窗文人或蓬门学者，那是绝对做不到这般盛大壮观的。有位者应该有为，如果无为，那就是尸位素餐，愧对俸禄。而某些有位者只在搞形式主义的“有为”，其结果是不自觉地制造了文化垃圾和学术废品，导致资源和成本的浪费。

三、学人多悲辛。许多取得成果和荣誉的学人往往家境贫寒，生活清苦。这一点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一般人总以为，历史上的学人成果丰硕，垂范今日，并在后人的时代里获得了显赫荣誉，那么他们生前的衣食住行也一定是富足富裕，甚至是豪华高贵的。其实恰恰相反，大多历史学人其生前都是生活寒苦，一片悲辛，甚至命运多舛，生计艰难。但他们或不甘生命沉沦，或追求千载荣名，或迷恋一脉书香，或钟情一门艺业，或担当历史学任，都以坚忍刻苦的意志创造出了自己的学绩而名垂史册。乾嘉时期的洪亮吉、黄景仁等诸多学者便是其中的典型。俊岭的书中有这样的文字：“清代学人游幕，多是因家境贫寒，科举不第，不得已而为之。”他还用例证法和引证法展示出了这一事实。书中说的虽然只是清代部分游幕学人的生活状况，但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多数学人的生活状况。我在思考：中国古代学人为什么大多数都这么贫寒和清苦呢？在贫苦和悲辛中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学问呢？杜甫的“文章憎命达”说的就是他们的命运吗？

俊岭的书稿使我想到他以前发表的论文：《吴大澂的金石研究及其书学成就》（刊于《书法研究》）、《略论清代书家的游幕活动》（刊于《中国书法》）、《论南孔文化对南宋书院的影响》（刊于《齐鲁学刊》，合作），这些文章都做得扎实可靠。他不仅是一位下笔有据、言之有物的青年学人，而且是一位笔路正道、书风纯雅的青年书家。其学风、书风深受乃师曹宝麟教授的影响。凭着现在的年华和身份，俊岭是有条件有资本去趋炎附势或哗众取宠的，从而滋润地生活，可他仍坚持学人品格，选择继续坐冷板凳，钻故纸堆，躲进小楼，苦中觅乐。他是不是很背时呀？白云在青空抖动，人们在都市奔忙，当大地在窗外睡觉，我看，俊岭的心在窗内依然醒着。

读完俊岭送来的《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与乾嘉碑学》这部书稿，我多其踏实，嘉其坚志，感其诚朴，遂欣然命笔，乐为之序。

张志攀

2014年谷雨时节撰于浙江师范大学

序 二

正当金陵梅花盛开，春雨霏霏之际，收到了俊岭兄新作《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与乾嘉碑学》书稿。蒙兄错爱，亲嘱为序，敷衍此篇，聊以复命。

我与俊岭兄是暨南大学读硕士时同窗，清代书法史研究一直是我们都很关注的领域。近年来，清代幕府与书法研究相结合逐渐为学界关注。清代有影响的幕府，如朱筠、毕沅、阮元、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幕府，幕主既是位高权重的官员，又是学富五车的大儒，因此其幕府活动就不仅限于某一个领域，而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则与书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特征成为幕府研究与书法研究结合的绝佳切入点。这本《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与乾嘉碑学》便是俊岭兄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

书稿甫读一过，便觉如入宝山，其新见迭出，令人目不暇接。我以为，本书主要有两大亮点：一是，将三家幕府的学术活动和当时书坛的篆书创作实践联系起来，揭示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可以视为宏观的研究。二是，以洪亮吉为个案，细致分析了乾嘉时期书法史中一些含混不清的细节，并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这可以视为微观的研究。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乾嘉时期的学术生态和书法图景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先看第一方面，虽然长期以来学者对清代的学术活动与书法实践之间的联系多有研究，但是对学术活动为何会影响到书法实践，这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或语焉不详，或疏于论证，总之颇有雾里看花，远隔万重之感，这不能不说是书法史研究的一大遗憾。而本书作者则依靠大量的文字与图像资料，将乾嘉时期的学术活动与书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影响途径、发生细节等问题进行了缜密考证与梳理。

如在第一章朱筠幕府中，朱筠个人的学术主张——通经必先识字，识字必以六书为先——直接促成了《说文》学的盛行，相应篆书的研习与创作自然逐渐得到重视，这一逻辑关系被作者清晰地梳理出来。在重视文字正确性观念的影响下，“参以六书”的理论又进一步影响到了隶书、楷书的书写和创作。朱筠幕府主要是通过罗致人才——如王念孙、邵晋涵、章学诚、黄景仁等学界才俊，和组织学

术活动——如校书尤其校刻《说文解字》，来使其学术思想得以传播和被接受。同时朱筠的学术思想也通过建议开设四库馆和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对金石文字书籍的搜罗与推荐得以部分体现。编书、校勘必然要求对文字正讹进行考辨，乾嘉朴学由此大倡。而对文字的重视，直接体现为当时学人的书法创作重视篆书、隶书，甚至一度形成“参以六书”的风气。这一切都与朱筠分不开。因此，朱筠的学术思想通过幕府活动在内的多种渠道，最终影响到了书法的创作重心和评判标准的转变。作者对这一脉络清晰而合乎逻辑的梳理，主要依赖于对当时诸多学人诗文集集中的记载，以及书法图像资料的运用和分析。如作者对当时学人诗文中用字的辨析，对戴震、江声、伊秉绶、洪亮吉、钱坫、翁方纲、黄景仁等人书法作品的运用，使得这一结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而在其他两章关于毕沅、阮元幕府的研究中，作者也梳理出了幕主的学术思想——幕府活动——书法理论与创作这一线索。当然，篆书是当时幕府中人书法创作中使用最为直接和活跃的字体，书中的论述也最为充分。至于其他字体如隶书、楷书的创作理念与实践，作者也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

这既体现了作者对朱筠、毕沅和阮元的学术思想通过各自的幕府影响到书法创作观念与实践问题的认识是全面的——因为这一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艺术问题；也体现了作者对众多类型史料的熟悉程度和驾驭能力。

显然，幕主的学术思想对幕府中人的学术理念、书法审美标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从书法创作风格来说，幕府的影响有多大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幕宾是否接受，以及幕宾的书法风格是否真的是因为入幕而形成或者有所变化等等，都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碑学理论的产生或许并不仅仅因为学术思想一端，其影响途径也许并非仅限于幕府一途，但作者对幕主学术思想、幕府活动和碑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线索详细、谨慎而遵循史实和逻辑地梳理，仍然是本书的最大亮点之一。

如果说对乾嘉时期幕府与书法的宏观研究是一幅小比例尺地图的话，那么本书的微观研究就像一幅被不断放大的地图，直至将地面上的街道、建筑物乃至行人看得一清二楚。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本书第五章对洪亮吉的研究中。

在目前关于清代碑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中，并不缺少对细节问题的讨论，但是像本书第五章对洪亮吉研究那样富有创见的发现和对史实进行如此深入细致的剖析，仍不多见。这一部分以洪亮吉的幕府生活为线索，通过对史料极为认真的分析，不但勾勒出洪亮吉在学术思想方面受幕府中人的影响以及转变过程，也描绘了洪氏对碑学理论和书法实践的思考过程、心态变化。而幕府对洪亮吉的碑学书法实践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则是作者尤为着力解决的问题。作者通过对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尤其是洪亮吉书札十四纸）的细致排比分

析,提出了“阳湖笔法”的概念,揭示了洪亮吉在清代碑学理论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廓清了长期以来学界对碑学书法实践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在这一部分,作者特别细致地澄清了几个重要的细节问题。首先,对阮元碑学理论的提出与洪亮吉二者关系的讨论。作者认为阮元提出“北碑南帖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洪亮吉在书法实践上取法隋前石刻的启发。由于洪亮吉对碑学理论并无明确的文字阐述,因此这一设想尚无法坐实,但仍可予人启发。其次,如果说洪亮吉对阮元的影响还只是可能的话,那么洪氏对碑学书法的实践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黄乙生、包世臣。同为阳湖籍的张琦及其女张纶英,也不能不受到洪亮吉的沾溉,又进一步波及赵之谦。这一线索的明确,同样建立在对文献记载和图像分析的基础之上,有相当的说服力。第三,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阳湖笔法”的概念,并确立了洪亮吉作为“阳湖笔法”奠基者的地位。这一发现,可以视为目前清代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开创性成果。不妨引用书中原话如下:

在对洪亮吉展开个案研究时发现洪亮吉是较早取法北碑者,而黄乙生是洪氏老友黄景仁的儿子并在洪氏的抚恤下方得以成立,张琦为洪氏弟子张惠言弟,由此认为洪亮吉是“阳湖笔法”的开创者。后来在对阮元展开研究时,发现阮元与洪亮吉有着较为持久的交游,阮元的北碑理论又是在洪氏卒后方才提出的,所以由此认为阮元的碑学理论也受到了洪亮吉的影响。本文用“阳湖笔法”这一概念主要为了阐述清代北碑笔法的渊源与传承,及洪亮吉在北碑笔法的形成与流传方面所具有的开拓意义。(第五章第四节)

当然,书中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判然分割的,而是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如在宏观研究中,作者还对晚明与乾嘉时期的“古文奇字”概念进行了细致辨析(这也是本书中富于创见的部分之一);在微观研究中,作者也试图将阮元、洪亮吉、黄乙生、包世臣、张琦、赵之谦等人之间的承继脉络清晰地展现给读者。

最后,作者在写作中流露出的人文关怀也不能不提及。书中所论诸幕中学人,大多家境不佳,求学匪易,他们虽然才华过人,但人生之路却颇多坎坷。有的学人即使被幕主视为知己,在幕中也并非事事遂心,寄人篱下,甘苦自知;有的则命途多舛,一生颠沛,甚至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因此在相关章节的字里行间,还流露着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以为这些带有温度的叙述并不会影响本书的学术性和结论的客观性,相反还为本书增色。

是为序。

同窗 李吾铭
甲午二月于金陵随园

前言

中国书法发展到清代,碑学渐起并在乾嘉之后蔚然兴盛。^①这既是书法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在对清代碑学发展产生影响的诸多外在原因中,清代幕府无论是在碑学的倡导与普及,还是在学书风气的转变上均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国幕府制度始于战国时期,于汉、唐较为兴盛,宋、元、明之际趋于衰落,在清代则出现了极为兴盛的局面。清代幕府制度的兴盛,使清代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受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清代碑学的发展亦不例外。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是清中期影响较大的三家学人幕府,伴随着乾嘉朴学的兴起、兴盛与衰落,幕府中的学术活动、教育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对乾嘉之际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乾嘉碑学的发展,尤其篆书、北碑书法的发展,也深受这三家幕府的影响。

三家幕府的学术活动推动了清代碑学的发展。三家幕府是当时较大的学人幕府,在治学上都倡导重于训诂考证的汉学,幕中幕宾众多,可以说三家幕府是当时汉学家的大本营。朱筠幕府中的人员后来大都进入毕沅幕府,毕沅幕府中的成员又大都进入阮元幕府,三家幕府在治学宗旨及幕府人员流动方面都具有相承性。朱筠在视学安徽时以朴学训士,倡导识字通经,劝人多读汉唐经典、注疏,又上开馆校书折子,使四库馆得以开设。四库馆的开设,使以训诂考据为主的学风成为当时主流学风。毕沅幕府是与四库馆并行的最大的一个学人幕府,幕府中治学以文字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诸子学为主。阮元幕府是四库馆之后的一个较大的学人幕府,治学以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地理学为主,尤以经学为主。就经学而言,阮元在浙江任上倡导古文经学;在广东任上则倡导今文经

^① 书法意义上的“碑学”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用法主要指晚清取法于南北朝时期以北朝碑版石刻为主的书法。广义的用法指清初以后取法唐以前二王体系以外的金石文字,以求古拙质朴的书法。出于名家之手的唐碑,则不被列为碑学系统的书法资源(本文对“碑学”的界定主要取自于白谦慎《傅山的世界》)。本文中的“碑学”是个广义概念。然当“碑学”与“帖学”并举时,“碑学”所指不包括篆书、隶书。在第三章中,“碑学”“帖学”并举时,“碑学”主要指北碑书法。“碑”“帖”并举亦如是。

学,使学风出现新动向。可以说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见证了乾嘉道之际学术风气的发展与变化。文字学关乎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金石学可考经证史,所以文字学、金石学在三家幕府中皆得到了较大发展,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碑学的发展。篆书、隶书、北碑书法在三家幕府的影响下皆得到了较大发展。因隶书在明末清初已得到一定发展,到乾嘉之际已呈现出一种正大气象,而篆书、北碑书法在乾嘉之际刚刚兴起,所以三家幕府的学术活动对篆书、北碑书法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家幕府的学术活动推动了乾嘉篆书的发展。清代篆书的发展主要与《说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三家幕府对《说文》学的重视,直接推动了清代篆书的发展。朱筠视学安徽时校刻了《说文解字》,使《说文》之学大行于世,幕中的洪亮吉、汪中等人在研习《说文》时遂习篆书。四库馆的开设使训诂考据成为时人的主要治学方法,学者治学必须先识字,这样许多学者在治学中开始研习篆书。毕沅幕府中先后刊刻了《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音同义异辨》《释名疏证》等文字学著作,幕中的钱坫、洪亮吉、孙星衍在治学时也把篆书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阮元幕中刊刻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及幕宾朱为弼、陈寿祺等人对金文笔法又进行了探索,使篆书由秦小篆向商周金文方向发展,同时阮元幕府对篆书风格多样化也进行了许多探索。

三家幕府的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北碑书法的发展。朱筠为了劝人识字,在日常书写中参以六书,书作中篆隶行楷相杂,效仿者众。毕沅幕府搜访了大量金石,并刊刻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为书家取法提供了金石资料,同时又提出“临帖不如临碑”的论点,为北碑书法的兴起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阮元在前人的基础上,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大力倡导北碑,使北碑书法在后来得到较大发展。伊秉绶受朱筠影响,在书作中参以六书,使书作亦篆隶行楷相杂,并对隋前石刻笔法进行了许多探索。洪亮吉受朱筠影响,在字中亦参以六书,后在毕沅幕府中接触了大量金石,遂由此上溯,对隋前石刻笔法展开了探索,他的实践影响了阳湖后学,又由弟子黄乙生传之于包世臣,进而影响到晚清赵之谦。

三家幕府中的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活动对清代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三家幕主都为积学大儒,都重视教育,喜将幕宾作为弟子来精心培育。他们不仅亲自教导弟子,又通过设立书院来作为培养弟子的专门场所。他们的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碑学的发展。三家幕府中都有较多的文化艺术活动,如朱筠幕府中的访碑活动,毕沅幕府保护碑林的活动,阮元幕府摹刻古碑的活动,这些活动也推动了碑学的发展。

清代幕府制度的兴盛,使一些有一技之长者能从容出入各幕府之中。清代

的书家也大都有游幕的经历。书家在游幕过程中,不仅可以改善生活条件,而且可以在学识方面受到较大影响,甚至实现学术的转向,同时其名声亦能为外界熟知。游幕之人往往也可以与幕主、幕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些交谊可谓贫交生死。同时,游幕活动对于书家的书法审美倾向、书法取法、书法风格的形成也有较深影响。洪亮吉为游幕书家中受幕府生活影响较为明显的一个。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书共分为五章。前三章分别阐述朱筠、毕沅、阮元三家幕府的学术活动与乾嘉碑学的关系。经学、文字学、金石学与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经学又是诸学问的根柢,所以书中在阐述这部分内容时的线索是由经学到文字学、金石学,再到碑学;在阐述碑学中的篆书、北碑书法时,也主要从经学、文字学、金石学三方面进行观照,力求文中的相关论点能持之有据。第四章主要阐述三家幕府中的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活动对碑学的影响,这既是对幕中学术活动的补充,也是为了揭示幕府对碑学发展的影响的多样性。第五章以洪亮吉为个案阐述游幕活动对书家生活、学术、教育、情感世界等方面的影响,尤其阐述游幕活动对书家书法取法的影响,揭示乾嘉之际北碑书法的发生、发展过程。

本书所用图片,凡比较重要的图片皆注明其出处,一般的图片皆不注明。书中人物生平可查者,皆注明生卒年月。生平不详而又无关紧要者皆不注明。

目 录

第一章 朱筠幕府的学术活动与碑学	(1)
第一节 朱筠的学术与交游	(1)
第二节 朱筠幕府、四库馆与乾嘉学风	(7)
第三节 朱筠与乾嘉篆书	(19)
第四节 朱筠与乾嘉学者的“参以六书”	(34)
第二章 毕沅幕府的学术活动与碑学	(72)
第一节 毕沅的学术与交游	(72)
第二节 毕沅幕府的学术与书法	(76)
第三节 毕沅幕府与乾嘉篆书	(90)
第四节 毕沅幕府与隋前石刻	(109)
第三章 阮元幕府的学术活动与碑学	(126)
第一节 阮元开幕前的交游与治学	(126)
第二节 阮元幕府的学术与书法	(134)
第三节 阮元幕府与乾嘉篆书	(145)
第四节 阮元的书学理论	(166)
第四章 三家幕府的教育、文化艺术活动与碑学	(181)
第一节 朱筠幕府的教育活动	(181)
第二节 毕沅、阮元幕府的书院教育	(200)
第三节 三家幕府的文化艺术活动	(211)
第五章 洪亮吉的幕里幕外	(233)
第一节 游幕时期的活动	(233)
第二节 后游幕时期的活动	(243)

第三节 洪亮吉对隋前石刻的取法·····	(258)
第四节 洪亮吉与“阳湖笔法”·····	(296)
主要参考文献·····	(314)
索 引·····	(324)
后 记·····	(326)

第一章 朱筠幕府的学术活动与碑学

第一节 朱筠的学术与交游

一、生平与学术

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1757)散馆授编修,充武英殿编修官、《平定准噶尔方略》纂修官。二十六年(1761)充恩科会试同考官。三十二年冬(1767)授翰林院右赞善。三十三年(1768)擢翰林院侍读学士,旋充日讲起居注官及顺天乡试同考官。三十四年(1769)充会试同考官。三十五年(1770)任福建乡试同考官。三十六年(1771)三月充会试同考官。十月奉命提督安徽学政。三十八年(1773)九月因公事不合程序,罢官。还京后在四库馆行走,以编修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四十四年(1779)八月奉命提督福建学政。四十六年(1781)二月还至京师,六月病卒。著《笥河文集》十六卷、《笥河诗集》二十卷。

朱筠远祖于宋南渡时自河南迁于浙江萧山。父讳文炳,字豹采,雍正四年(1726),奉命出为陕西盩厔县令。朱筠于雍正七年(1729)生于陕西盩厔县署。乾隆二年(1737)随父举家归京师,置宅于日南坊李铁拐斜街之北,闰九月与弟朱珪等从学于定兴人史犹兴(1714—1765),事三年,通五经,学为文。^①七年(1742)与弟珪从学于秀水蒋德。八年(1743)与弟珪从学于嘉兴朱矩堂。十年(1745)四月从学于仁和吴光升(?—1772)学为制义,凡两月。吴氏“独喜谈制义

^① 朱筠:《史先生墓碣铭》,《笥河文集》卷十三,《丛书集成初编》,2509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259。

不倦,然以为制义非根柢经史不可”^①。其中,蒋德对朱筠后来的治学思想影响较深。蒋德(1713—1766),字敬持,因所居处近秋泾桥,又自号秋泾先生。工诗文,著有《秋泾诗文集》若干卷。乾隆七年(1742)春夏间馆于朱文炳家,时朱筠年十四,朱珪年十二,“先生得之喜甚,以为可教,为余兄弟纵谈古今,时时奖诱之”^②。蒋德馆于朱家时,“先君所以待先生者尤重且谨,惟恐不当意。先母为先生设食,必手治之。先生云:‘蒸鸡子者必用箸调之,度三千箸乃可食。’每朝食,先母调食必如其箸之数。顾谓余兄弟曰:‘若辈幸得名师,我岂惜手指力耶?’他日,先生闻之,所以教余兄弟者益至”^③。蒋德于秋季离馆,共馆于朱家三月。据朱筠《蒋秋泾先生别传》载:“至今余兄弟私计读书无所进益,其有所进益,无若从先生时。”^④十三年(1748)朱珪中进士,朱筠“独从先生游,学益进。初先生奖借珪甚至,至是乃亟赏兄而责珪严,不少假颜色”^⑤。

朱筠于学不宗一术,在经学、史学、文字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礼仪学、制义学等许多方面多有论述,“博闻宏览,于学无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参宋元诸儒之说,论史宗涑水,而历代诸史亦皆考究贯串,证其异同”^⑥。治学以汉学为旨归,“至于文字训诂、象数名物、经传义旨,并主汉人之学,以谓与作聪明,宁为墨守”^⑦。在义理与训诂方面,“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⑧。然在诸多学问中,朱筠认为经学是诸学问的根本,士不通经不足致用。^⑨乾隆十七年(1752)蒋德会试下第归里,朱筠作《送秋泾夫子南归三首》以为别,其二曰:

① 朱筠:《吴集潭先生哀辞并序》,《笥河文集》卷十五,《丛书集成初编》,2509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305。

② 朱筠:《蒋秋泾先生别传》,《笥河文集》卷十五,《丛书集成初编》,2509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287。

③ 朱筠:《蒋秋泾先生别传》,《笥河文集》卷十五,《丛书集成初编》,2509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287。

④ 朱筠:《蒋秋泾先生别传》,《笥河文集》卷十五,《丛书集成初编》,2509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287。

⑤ 朱珪:《跋蒋秋泾师诗钞》,《知足斋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14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338。

⑥ 王昶:《朱君墓表》,朱筠《笥河文集》卷首,《丛书集成初编》,2506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15—16。

⑦ 章学诚:《朱先生墓志铭》,朱筠《笥河文集》卷首,《丛书集成初编》,2506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12。

⑧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页224。

⑨ 朱筠:《劝学篇序》,《笥河文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2507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79。

文章溯向雄，本大末始畅。流传到后来，剽贼真气丧。
如缀敝锦衣，刻意谋共张。夫子不好名，恶文以纲尚。
每于数千年，剖别指南向。峨峨韩与柳，六经作家酿。
宋兴盛四氏，流征和高唱。南渡龙川别，北京奔州放。
太仆山之砥，叔子川以障。此岂比雕虫，与道伯仲行。
教之穷根源，敢不钦所养。^①

朱筠在诗中阐述了文章的“本”与“末”的关系，认为文章只有“本大”方能“末始畅”，文章之“本”在六经，历代文人如扬雄（前 53—后 18）、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人文章皆是以“六经作家酿”。由“教之穷根源，敢不钦所养”可知，朱筠所阐述的六经为本的思想主要得益于蒋德。后来朱筠又作《玉琢》诗云：

学者志古人，识字从蝌蚪。六经树厥根，诸子及其波。
子能从此学，所得亦已多。高抱慕其元，其下众妙罗。^②

诗中“六经树厥根，诸子及其波”也表达了朱筠的六经是文章之本的学术思想。朱筠又认为关乎科举的制义之学也根柢于六经，其《安徽试卷序》云：

制义之设何所原乎？说者以为原于北宋王安石、苏辙诸人之经义，而自前明承用之至于今。不知其原出于唐《五经正义》也。《正义》《易》用王弼注，《书》用孔安国传，《诗》用毛萇传，郑康成笺，《春秋》用杜预解，《礼记》用郑康成注，而敕孔颖达等疏之曰《正义》。……然则诸生之为文当法唐《正义》之所以疏经及传笺注解者而后可。欲法之则凡于经之天地、山水、宫室、器用、衣服、鸟兽、草木、虫鱼之详，悉皆当周知，而先之以训诂，然后其于经之义秩然、粲然、怡然、焕然也。^③

朱筠认为，制义之学始于唐《五经正义》，非始于宋，唐《正义》乃本于汉儒经典。又认为诸生学制义应从汉、唐疏笺入手，只有先明训诂，然后才能通经义。

朱筠又认为通经须先识字，“尝谓经学不明，良由训诂不通，通经必先识字，

① 朱筠：《送秋泾夫子南归三首》之二，《笥河诗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143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490。

② 朱筠：《玉琢》，《笥河诗集》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143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625。

③ 朱筠：《安徽试卷序》，《笥河文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2507 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 77—78。

庶几两汉诸儒所讲之经可以明，而后世望文生义之弊绝”^①。其《请正经文勒石太学以同文治折子》云：

校艺之余，辄举御纂钦定诸经及《康熙字典》与之讲习，诸生亦颇蒸蒸向风。第其中词彩可观，而朴学未尽。每阅数卷，俗体别字，触目皆是。……良由经训之未深，以致字体之固定。江南且然，何况小者。其何以识字通经，由乡、会两试进应殿廷之对乎？臣窃惟书契之作，圣人所以治百官而察万民，周礼汉律，童子试诵，职在小学。^②

总体上，识字通经是朱筠学术思想的核心。他时时劝勉士人从汉唐经典、注疏、训诂入手。

二、学术交游

在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进士中，庄培因(1723—1759)、王鸣盛(1722—1797)、纪昀、王昶、钱大昕、沈业富(1732—1807)、丁杰(1738—1807)等人皆与朱筠同榜。这一年的许多学者后来对乾嘉学术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同年中，纪昀、王昶、钱大昕三人与朱筠关系较密。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三十三年(1768)因罪流放新疆。三十八年(1773)任四库馆总纂官，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历任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尚书。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朱筠入四库馆后，纪昀曾作诗相赠，朱筠次韵答之：“我才草草蒯与菅，君姬姜美如蚕鬓。江南君行壁几碎，我璞一跌亦一斑。乃知鬼神瞰吾辈，奇福忌享佳水山。……两年耳目绝平淡，放步所到追穷奸。……闻君昔游一不顾，闭目西子湖中闲。苦吟嘲我费日力，一隙偷向诗书删。我胡能赞君厕席，手不遑暇足暂闲。日高睡为麋鹿梦，且任呼者来当关。”^③朱筠在诗中对纪昀的学术甚为推崇，又回忆了二人的友谊。其中“江南君行壁几碎，我璞一跌亦一斑”则指二人同遭罢官事。

① 朱锡庚：《笥河文集卷首》，朱筠《笥河文集》卷首，《丛书集成初编》，2506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3。

② 朱筠：《请正经文勒石太学以同文治折子》，《笥河文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2506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页1。

③ 朱筠：《入四库馆纪晓岚同年作诗相赠，次韵答之》，《笥河诗集》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14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620。